高教动态

2026 年第 10 期（总第 142 期）

汉江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高教研究所）　　2026 年 10 月 13 日

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二）

目　录

■ 走好应用型本科特色发展赛道

■ 新时代地方应用型高校“双优”建设的理论内涵、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 “双优”评价模式构建的逻辑机理与实践方略

■ 别敦荣：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与师范院校战略选择

走好应用型本科特色发展赛道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瞄准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定位模糊、产教脱节、办学同质化等突出问题，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激发分类发展动能”。随着《意见》出台，高校分类发展的顶层设计更加清晰，也为“双优”建设的推进提供了总体指引。在此框架下，“双优”建设与侧重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面向职业院校的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简称

“新双高”）将汇聚合力，共同推动高等教育新格局的构建。

然而当前，部分地方的政策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有观点建议将“双优”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未入选高校的分流渠道；也有观点建议部分“双一流”省级培育高校调整赛道，以“双优”建设作为政策过渡。这些看法虽侧重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双一流”建设的遴选结果来安排“双优”建设的功能定位，其中也隐含着将“双优”建设视为兜底性承接渠道的可能。

若简单按照上述思路，很可能削弱应用型本科相对自主的类型定位，模糊其评价标准，也容易使应用型本科在观念上被看作相对次要的办学选择。若相关倾向得不到充分讨论和有效引导，“双优”建设就可能在实际推进中被更多地定位为“双一流”的补充或过渡安排，而非一种具有自身类型特征的应用型本科建设。

简单分层分流可能消解分类改革价值

分类发展的关键，是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找准赛道、错位发展，而非以单一学术标尺对所有高校进行分层排序。若将“双优”建设遴选简化为按“双一流”建设结果划入，操作上或许简便，却容易把分类建设简化为分层分流。

国家布局“双优”建设，旨在引导应用型高校扎根区域产业、培育适配人才、开展应用技术攻关。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双优”建设遴选真正立足于应用型本科的类型定位。一旦采用“过渡式”划入的思路，不仅会偏离上述目标，还可能从三个层面影响政策成效。

一是可能进一步模糊高校办学定位。部分地方本科高校长期以研究型大学为参照，偏重博士点、高层次论文等学术指标，对实践教学、产教融合等应用型核心任务关注相对不足。若将“双优”建设主要作为“双一流”建设未入选高校的过渡性安排或承接渠道，容易使高校形成一种印象，即应用型本科在政策序列中相对次要。即便进入建设序列，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原有办学惯性，产教融合、服务地方等任务，难以成为办学重心，甚至在资源配置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

二是可能影响有限建设资源的精准配置。“双优”建设计划支持 200 所左右高校，配套政策、资金、平台资源相对有限。若遴选时没有充分考虑办学基础和产业适配度，而主要依据“双一流”建设遴选结果进行划分，部分转型意

愿尚不明确、产业对接基础较为薄弱的院校也可能进入名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占用或分散有限的建设资源，使长期深耕应用型转型、持续服务区域产业的优质院校获得重点扶持的机会相对减少，“打造特色标杆”的建设目标也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三是可能弱化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整体成效。若赛道划分未能充分依据办学类型和服务面向，部分高校可能仍会延续以学术科研为参照的办学惯性，进而加剧办学同质化，高等教育对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支撑作用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构建适配应用型本科的建设与遴选机制

要避免上述倾向，关键在于从国家、地方和评价三个层面，构建与应用型本科功能定位相适配的建设与遴选机制。

国家层面出台建设标准，锚定应用型核心标尺。加快发布国家级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建设规范，建立区别于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标准，突出应用导向和成果转化，把特色应用型学科专业集群、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质量及实际运行成效、科技成果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的匹配程度、毕业生就业质量及其与区域产业需求的适配度作为遴选核心准入条件，从顶层设计上减少地方简单分层操作的空间。

地方层面完善遴选机制，破除“简单分流”思维。单独考察院校应用型转型的实际成效：对主动对接地方主导产业、长期开展企业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匹配度高的高校优先支持；对定位摇摆、一味对标研究型大学、服务地方能力薄弱的院校暂缓纳入，引导高校主动锚定应用型发展定位。

与此同时，要建立专属考核评价体系。配套出台区别于“双一流”建设的“双优”建设考核办法，降低纯基础理论论文、纯基础研究类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考核权重，重点增加企业横向课题、产业技术攻关、毕业生本地就业率、地方发展决策咨询成果等应用型指标，引导高校把核心资源投向服务产业、培育应用型人才的主赛道。同时面向教育管理者、高校师生和社会公众系统倡导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理念，明确不同类型高校不宜简单按照单一标准进行价值排序，应当依据不同功能定位建立相应的发展标准和评价体系。

以自身发展逻辑推进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建设

上述建设标准、遴选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能否真正落地，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并尊重应用型本科自身的发展逻辑。推进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建设，是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落实分类发展的重要契机。其意义不在于增加一个新的建设项目，而在于探索不同类型高校如何依据自身功能定位实现高质量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当有自己的建设标准和评价体系，不能简单照搬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也不能被理解为其他高校建设项目之外的“补充选择”。推进分类发展，关键不是简单调整高校所处的政策层级，而是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找准自身位置、形成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

面向“十五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不是更多高校在同一赛道上竞争，而是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赛道上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地方教育部门在政策落地中，应跳出传统、单一学术评价的思维桎梏，避免简单化、过渡式的划分方式。唯有让“双优”建设真正走出“双一流”建设的影子，才能造就一大批扎根地方、特色鲜明、产教深度融合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信息来源：姜建明《中国教育报》2026 年 9 月 23 日）

新时代地方应用型高校“双优”建设的理论内涵、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问题缘起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分类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进一步要求，“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于 2026 年全国两会期间，首次公开强调地方应用型高校应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专项部署，建设 200 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并提出布局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建设现代产业学院与区域

产教融合创新载体等要求。这标志着继面向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和面向高水平职业院校的“新双高”之后，国家政策层面开始对数量庞大、与区域发展休戚与共的地方应用型高校，提出了更为清晰和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要求。

“双优”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但当前学界对其核心内涵、内在逻辑及系统化实施路径缺乏系统性学理阐释，亟待深化理论研究以支撑实践。尽管政策导向明确，但审视发展现状，地方应用型高校仍普遍陷入多重困境。在战略定位上，同质化倾向明显；在校地关系上，合作缺乏深度嵌入；在人才培养上，与区域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在评价激励上，仍不同程度受制于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办学理念未能彻底转向应用与服务，治理体系未能围绕区域需求进行根本性重构。因此，系统阐释“双优”理论框架，不仅是回应政策倡导的学理需要，更是突破地方高校发展困境、推动其实现特色发展与价值跃升的迫切要求。本文旨在对此进行系统性理论建构。

二、“双优”的内涵探析

1. 理论溯源与政策演进

“双优”这一政策理念的提出，深植于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长期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在办学理念层面，学界早已确立了地方应用型高校“服务地方”的核心价值取向。潘懋元系统论述了应用型本科高校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办学逻辑；刘献君提出“教学服务型大学”概念，将“教学”与“服务”并列，奠定了“培养应用型人才、产出应用型成果”的双重目标雏形，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明确了根本方向。

在发展路径层面，学者强调“特色与融入”的实践逻辑。别敦荣从定位视角，主张应用型高校应“一校一案”，通过与地方深度结合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钟秉林等则从更宏观的集群发展视角，指出区域内高校应协同互补，形成服务区域的知识密集型特色。

在制度保障层面，学者呼吁建立分类指导与评价体系。黄福涛指出，地方高水平大学亟待建立“分类指导—重点扶持—多元评估”的制度体系，以支撑其走向卓越发展。这反映了学界对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以引导和保障地方高校特色发展的迫切期待，为“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优秀”的评价导向提供了理论铺垫。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已从服务地方的价值取向、特色融入的发展

路径以及分类评价的制度保障等方面，为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积累，也为理解“双优”建设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学理基础。

从政策演进看，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发展的政策逻辑呈现出由“转型引导”向“分类发展”、再向“质量提升”的递进过程。2015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服务地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转型方向，政策重点主要在于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实现办学类型转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进一步强化分类发展与特色发展的制度导向，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进入“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进一步将办学能力与区域服务贡献作为核心目标，政策重心由“转向应用型”进一步转向“建设高质量应用型”。由此，地方应用型高校政策经历了从类型转型、分类定位到能力建设与区域贡献协同提升的发展深化，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凸显。

2. 学理内涵与辩证关系

“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共同构成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但二者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是在价值旨归与能力支撑上的辩证统一。其中，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体现高校办学价值，办学能力优质则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基础条件。

“办学能力优质”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履行区域服务使命的能力基础和重要支撑。它聚焦高校自身的内涵建设，核心是形成与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这具体体现在：一是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动态对接的敏捷性与精准性；二是构建产教深度融合育人模式的能力，能够将产业技术变革和实践前沿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建设一支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四是形成与现代大学制度相匹配、能够有效保障应用型办学定位的治理体系。“办学能力优质”所回答的，不仅是“办什么样的学、如何培养人”的质量问题，更是高校是否具备高水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基础。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则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根本价值旨归

和办学质量的最终检验尺度。它衡量的是高校回应区域发展需求、创造区域发展价值的实际贡献及其广度、深度与效能。其贡献维度主要包括：人才供给维度，即为本土培养“留得住、用得上、发展好”的应用型人才；科技创新维度，即通过产学研合作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推动科技成果在当地转化；智库服务维度，即为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与文化服务。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而言，办学是否真正“优质”，最终要体现为能否有效回应区域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并形成不可替代的区域贡献。脱离区域发展需要、不能转化为实际服务成效的所谓“优质”，并不符合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因此，“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既相互依存，又并非简单并列、等量齐观。在价值逻辑上，“服务优秀”规定着“能力优质”的方向和价值尺度，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根本旨归；在实践逻辑上，“能力优质”构成实现高水平区域服务的必要基础和重要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首先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科技创新和治理方式提出问题并形成牵引，高校据此重构和提升办学能力，并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人才、技术、智力等方面的实际贡献；而服务成效又成为检验办学能力是否真正优质的重要尺度，并进一步推动能力持续迭代。由此形成“需求牵引—能力重构—服务增效—贡献检验—能力再提升”的闭环，使高校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3. 定位辨析

横向比较，“双优”体现了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分类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定位。与“双一流”建设相比，二者都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但在办学使命、知识生产方式及学科逻辑与需求逻辑的关系上有所侧重。“双一流”建设面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优势学科，强调学科逻辑与需求逻辑并重，既追求学科知识体系创新和学术前沿突破，也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知识服务回应国家战略需求。

“双优”建设则精准面向地方应用型高校，更加强调需求逻辑的主导作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均应主动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并在服务需求中优化学科布局和提升办学特色。与“新双高”相比，

“新双高”主要面向高等职业院校，侧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双优”则更加强调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以及面向区域产业发展解决复杂技术与实践问题的能力。由此，“双一流”“双优”与“新双高”分别立足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和优势领域，共同构成分类定位更加清晰、发展路径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支持体系。

纵向深化，“双优”对既有理念与政策的继承与超越。“教学服务型大学”更多是一种办学类型的界定；而“双优”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该类型高校的目标与质量要求，是从“是什么”到“建什么”“如何评”的操作性深化。与2015年启动的“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政策相比，当前的政策导向则是在转型基础上的“升级版”，强调从“转向应用型”到“实现高质量应用型”的跃迁，体现了在新阶段，地方高校从“规模转型”迈向“内涵提质”。

三、“双优”的时代价值

“双优”建设政策导向是高质量发展理念在地方高校领域的具体化与分类化表达，具有多重战略价值。

1. 填补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政策体系的结构性空缺

在现行政策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职业院校均有国家级专项计划支撑，而数量庞大的地方应用型高校长期缺乏与之匹配的顶层设计框架，在评价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明确以“双优”作为其核心发展目标与评价坐标，从国家政策层面赋予了这类高校清晰的身份和合法的发展路径，有助于从根本上破解其“同质化”竞争与“身份焦虑”困境。

2.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

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区域发展对本土化人才和适应性技术有着空前需求。地方高校具有“贴近产业、深入基层”的天然地缘优势。依托“双优”建设推动高校从区域发展的“伴随者”转变为深度嵌入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核心节点”，构建高校与区域深度耦合、共生共荣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支撑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功能。

3. 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与特色突围提供政策合法性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高校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下感到“高不成、低不就”。“双优”为其开辟了一条“错位竞争、特色发展”的新赛道，从最高政策层面肯定了其服务区域发展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高校优化学科专业、改革教师评价、重构资源配置逻辑，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变。

四、“双优”的实践路径

将政策导向转化为系统性实践方案，需遵循需求牵引、内涵支撑、协同联动、评价保障的逻辑，构建“定位校准—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能力提质—服务升级—评价牵引”五维实践路径，五个环节相互衔接、闭环运行。

1. 定位校准：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核心是实现“学校所能”与“区域所需”的深度耦合。高校应改变单纯依据既有学科基础进行增量扩张的惯性，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尊重学校办学基础与特色积淀的前提下，提高学科专业布局对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成功的实践表明，高校需基于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主导产业及自身历史积淀，在区域高等教育格局中精准找到“错位发展、补位发展”的生态位，形成“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独特优势，锚定“双优”建设总目标，确立“扎根一方、服务一方、引领一方”的共生型发展战略。

2. 学科专业重构：走对接产业的动态调整之路

学科专业布局是战略支点，必须建立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需求的联动响应机制。这要求高校建立常态化的产业需求调研制度，紧扣“双优”建设要求，对学科专业实施动态优化，对与区域需求脱节、就业质量持续不佳的学科专业建立预警和退出机制。同时，推动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集群的学科专业群，将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实现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融合。

3. 能力提质：走师生全面提升之路

以“双优”建设倒逼师资、育人模式改革，夯实应用型办学核心能力。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打破校企、校地壁垒，促进人才、知识、资源的双向流动。

在师资层面，必须改革教师评价与发展制度，大力培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将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经历和成效作为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解决教师“不会转、不敢转”的现实顾虑。在学生层面，要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育人模式，搭建覆盖全学段的实践创新平台，广泛聘请产业导师，推动学生在真实项目、真实场景中学习，培养其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4.服务升级：走从“点状响应”到“全域赋能”的校地共生之路

要实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必须推动合作模式升级。校地合作应致力于从零散、短期的单个项目合作（点），向服务特定产业链（线），再向与一个区县或领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面）深化，最终目标是构建“全校服务全域、校地命运与共”的融合发展新格局（体）。落实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双优”建设部署，统筹校内多学科资源，与地方、行业企业共建区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智库、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技术转移转化平台，实现从“被动响应需求”到“主动谋划赋能”的跨越，全面达成“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建设标准。

5.评价牵引：走多维贡献评估之路

评价改革是确保目标落地的“指挥棒”，必须围绕“双优”两大核心维度重构评价体系。在教师评价中，同等对待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成果，特别是将横向课题、技术转化、决策咨询采纳等作为重要依据。在院系与学校评价中，大幅提升毕业生本地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横向经费到款额、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等指标权重，并积极引入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第三方评价。通过评价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形成持续牵引高校迈向“双优”目标的内生动力。

五、结语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为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全新发展路径，完整构建“双一流—双优—新双高”的分类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地方高校推进“双优”建设，必须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价值导向，以办学能力提升为基础支撑，以评价改革激发动力，以制度创新保障长效。通过“需求牵引—能力提升—服

务增效—贡献检验”的循环，实现高校发展与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评价指标的操作化、不同区域类型高校的差异化路径，以及长效机制的实证追踪等方面。

（信息来源：吴家胜《大学与学科》2026 年第 3 期）

“双优”评价模式构建的逻辑机理与实践方略

一、“双优”建设：价值·特点

1.“双优”建设使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当“双优”建设提出后，其实践价值迅速得到认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政策正趋于完善。“双优”建设提出了判断应用型高校办学水平的内外双重标准：一是办学能力优质，二是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优秀。二者将极大地促进应用型高校内涵建设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应用型高校办学能力的强弱最终应体现在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上。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力量集中于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拨款，而且入学人口也主要来自当地，当高校办学能力达到优质水平时，其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助力，从而更容易获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对于地方政府治理而言也极为有利。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优秀意味着高校能够主动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服务地方发展，从而助力形成校地良性互动的社会生态。

2.“双优”评价标准应具有反思性、建构性特点。找到不同类型高校办学真正的区别点非常不易，正是这个根本难点的存在，使得“双优”评价“千呼万唤始出来”。因为高等教育学界短期内还无法呈现一个确切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指标来遴选适合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标准并发挥引导性作用，大众也只能根据高校最终的发展结果进行评价，这样的效力自然就大打折扣。很多教育改革的效果是多重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绝非某个指标或要素独立作用的结果，这就使得评价指标的构建异常困难。“双一流”建设的各种指标也是事后总结或经验反思的结果，并非一种超前的理性设计，基本是根据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一般经验进行设计，并非完全科学、合理，也不一定符合研究型大

学的个性发展规律。由此，“双优”评价标准必须具备反思性、建构性特点，才能使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有的放矢。

二、“双优”建设的逻辑机理：起点·中介·终点

1.“双优”建设的逻辑起点：确立社会服务理念。自从美国大学模式兴起之后,社会服务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社会服务精神也是美国大学发展的动力,社会服务功能对于所有美国高校都是适用的,因为这是美国高校适应市场机制的关键所在。当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为评价应用型高校办学水平的核心指标时，可谓抓住了关键。但“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优秀”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内与外、体与用，抑或是因与果的关系，我们可以把高校办学能力理解为内在、本体、原因，社会服务能力是外在、应用、结果，甚至理解前者是皮，后者是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内与外的关系非常明显，因为离开了办学能力本身，就谈不上社会服务。一般而言，如果一个高校在内外两方面都达到优秀水平，其整体水平就是优秀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双优”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双优”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系？

从逻辑上讲，办学能力优质并不一定代表社会服务优秀，社会服务优秀也不一定代表办学能力优质。事实上，两者不可能是一一对应关系，而且两者往往采用不同的评价尺度，遵循不同的逻辑，从而两者在表现上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办学能力评价维度比较全面，更侧重办学过程的评价，遵循育人为本逻辑，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性。比如是否符合国家政策要求，是否达到教学计划目标要求，是否满足学生发展要求，以及学生是否会顺利地走向社会。就目前而言，每所高校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方针办事，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而在达到教学计划目标要求方面就比较难以判断,因为这需要看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实际需求，能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其中的关键在于教学目标的要求并非固定不变，经常需要根据时代进步和实际要求做出调整。事实证明，目前不少问题都反映出高校教学内容、手段、方法已然落后，

换言之，传统的教学目标要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所以不能完全按照既定的目标来衡量。在是否满足学生发展要求方面也充满异议，现在课堂抬头率、满意度低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不容回避。此外，当前劳动力市场面

临结构性压力，高校毕业生在进入职业场域时所展现的胜任力水平，与产业端的实际用人需求之间尚存明显的适配性缺口，这也是国家特别强调要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根本原因。综合来看，高校在办学能力方面达到优质水平还需克服重重困难。

与之相比，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遇到的质疑更加突出。社会服务遵循市场竞争逻辑，强调效益如何。大学生就业状况本身就是衡量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能否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则是一个更关键的指标。如果高校具有社会服务精神，主动研究市场变化需要，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升级难题，那么校企关系、校地关系将得到极大改善。这种关系改善也将重塑大学教师的精神面貌，成为他们改革教学的动力源泉，如此也会带动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而引领办学能力的提升。显然，目前，高校在这方面表现欠佳，因为高校没有得到地方产业和企业的大力欢迎，常常出现“高校热企业冷”的情况。这也说明，办好应用型高校，做好社会服务是关键，具备社会服务精神是根本。

2.“双优”建设的逻辑中介：必须搞好应用型科研。应用型高校如何才能做好社会服务？从逻辑上讲，搞好应用型科研是根本出路。所谓应用型科研就是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为导向，不以论文发表为导向。换言之，科研能否取得实效是对科研能力评价的根本标准，而非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或引用率作为评价指标。这要求高校在科研立项过程中严格把关，审查问题来源，评价是否具有应用价值。为了保障科研的有效性，应用型高校开展科研必须要与企业进行合作，因为封闭式科研很难找到真问题，研究成果很难具有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机制普遍采用模仿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模式，倾向于论文发表的科研，对应用型科研缺乏实质性激励机制，从而开展应用型科研的力量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这也抑制了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和企业科技攻关的能力。

3.“双优”建设的逻辑终点：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高校必然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根本追求，这是办学定位所决定的。对于应用型人才是什么，学术界还缺乏严格的定义。已有的一些提法很难令人满意，如应用仅仅分为知识应用和技术应用，模糊了应用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的区别。为此，

需要对应用型人才做出操作性界定。应用型人才是指善于将专业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表现出对问题的敏感性，对专业知识的娴熟性，特别是具有勇于实践的品质。显然，应用型人才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与理论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相对的，后者都是针对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言的，但似乎并不适合本科教育层次。

对于本科教育而言，学术型人才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不以直接就业作为目标，对知识本身具有兴趣，有志于从事学术职业，求知若渴，喜欢探究问题，把进一步深造作为自己的价值选择。与之相对，应用型人才首先是以就业创业为目标，对实用技术技能非常感兴趣；其次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热衷于回应现实问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更能凸显个人价值；再次是对于物质奖励比较敏感，对市场变化反应非常敏捷，很容易从中获得成就感；最后是对于社会荣誉比较热衷，渴望获得社会认可，把追求事业成功作为人生目标。所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善于识别这些品质，并有意识地激发这些品质，使这些品质成为学生自觉成才的动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当具备明确的质性规定与量化标尺，切忌沦为缺乏界定的空洞概念。

4.“双优”建设的底层逻辑：重在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应用型高校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其能够把应用型科研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机统一。如何才能将两者有机统一呢？根本出路就在于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教师而言，要把课程教好，就必须了解学生实际需要，懂得市场需求，善于运用实践案例教学，而且能够把专业知识有机地嵌入课程。显然，如果教师没有具体的实践经历就无法理解市场需求，也无法真正走近学生。但课程教学又不能游离于教师科研工作之外，要将两者统筹起来就只有从事应用型科研。

应用型科研的典型特征是：研究问题是真实可感的，是亟待解决的，从而能够激发人强烈的探索欲望。如果能够把这种真实的问题情境带入课堂，使学生成为科研项目的参与者，引导他们在尝试解决问题过程中逐渐改变学习习惯，把接受式学习变为探究式学习，从而调动自己的知识内存，主动寻求资源求解问题，通过沟通合作获得启发，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创业能力也得到了开发。因为创新创业能力从本质上讲就是对问题进行确定、对问题进行分解、对各种可能性答案进行验证，最终找到解决方案，然后验证效果

如何。这个“发现—分析—解答”的过程，既是一个创新过程，又是一个创业过程，因为创新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统，如果没有创新作为前奏，就没有创业的效果。反之亦然，如果没有创业目标牵引，就难以产生创新活力。

教师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也同样遵循“发现—分析—解答”问题的逻辑，这意味着，教学活动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要教会学生会学习、会探索、敢于尝试，这就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这个过程应该通过教师身体力行来实践。如果把握了这个根本特点，就找到了“双优”评价模式构建的科学根据。

三、“双优”建设的实践依据：师资·平台·机制

1.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需要大批教学创新型师资。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所谓创新创业人才，简言之就是“敢闯会创”人才，这四个字道明了创新创业能力的真谛。其中“敢”是第一位的，即“敢为天下先”，敢字当头，说明了冒险精神对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性，不然创新潜能就难以激发；其次是“会”，说明必须具备综合素质，不然就难以融会贯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仅仅具有专业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有敢闯无人区的勇气，并且善于分析问题，善于多角度思考，善于把理论知识与现实情境有机结合起来，不然就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会创”的真切体现。“敢闯”“会创”相结合就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基本表现。

同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知识和能力不足时，必须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去学习和充实自己，这既是自我发展能力的表现，也是终身学习时代每个人必须具备的终身学习能力，同样也是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表现。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许多问题都没有固定答案，需要用敢于尝试的精神去寻求合适的答案，这种不满足于现成答案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的体现。因为任何答案都不是唯一的，都必须以适宜环境和最大功效作为衡量依据，这种对效益的追求过程就是创业能力的体现。所以，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高校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这是使其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显然，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教师自身首先必须具备创新创业品质，必须敢于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2.教学创新必须具备联系企业的能力。要做好创新型教学，教师就不能完全拘泥于书本知识，必须广泛地吸收社会实践知识，能够把现实中的真问题引

入课堂，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教学活力。现在学生普遍厌倦了照本宣科型的教师，开始广泛地通过网络资源吸收知识，从而使纯粹书本知识教学的局限性逐渐放大。如何让课堂教学充满新鲜感，是每个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深入实践一线。如果教师不深入实践一线，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课堂就难免缺乏趣味。这也呼唤课堂教学必须改革，首先要控制课堂规模，方便开展教学互动；其次要改变课程设计，引入实践内容，让学生真实体验到现实需要；再次是改变教学形式，增加现场体验，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最后要改变考核方式，让实践成果成为学生成长的证明，不然就无法为教学注入生机。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教师具备联系企业的能力，这样才能深入下去，获得真实的体验，如此才能带领学生深入生产现场，获得真切体验。这对于目前的教师能力素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联系企业需要高校搭建通向产业的平台。高校有责任创造条件来改善教师的能力素质结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高校要建立稳固的联系企业的渠道。无论从声望上还是从可信度上，由学校出面与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实践平台要比教师个人与企业联系要容易得多。无疑，这就需要大学组织创新，设立专门负责与企业联系的部门。同时需要进行大学制度创新，建立与企业有机联系的制度。这就要求改变大学与企业的关系，建立更多的横向联合关系。为此，要在制度设计中鼓励引入更多的企业资源为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服务。比如可以组建专业课程改革委员会，吸收企业中的优秀成员参与课程教学，使课程内容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感，使课程设计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建立密切的联系。目前，很多高校都聘请了企业高管作为学校发展顾问，这确实有助于加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但许多合作往往停留在协议上，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要让合作真正发挥作用，应该是双方合作开展专业建设以及科研攻关，这样才能把双方的利益关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4.建设合作平台需要建立融通高校与企业的机制。目前产教融合的难点在于难以融通校企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这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文化。高校是事业型组织，讲求社会效益，追求公益性；企业是营利性组织，讲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率，否则就难以持久下去。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就必须正视两种不同组织的文化区别，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能够融合两种不

同文化特质。换言之，建立高校与企业合作平台就需要打通两种不同性质的运行机制之间的隔阂。进而言之，企业运转遵循的是市场主导的运行逻辑，讲求利益分享，讲求成本效益。高校运行仍然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导，行政化色彩较浓，对利益关系敏感度偏低，对企业的运行规则认知不足，效率意识也较为薄弱，从而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分歧。为此，高校必须主动接纳企业的运行逻辑，尊重市场机制，这样才容易开展有效合作。故而，融通两种不同性质的运行机制，是高校开展现代产业学院实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衡量“双优”评价模式有效性的参照系。

四、“双优”建设的前期实验：基础·难关·突破点

1.现代产业学院是大学组织变革的重要实验。为了克服产教分离状态，使高校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开始进行现代产业学院改革试点。此举直指高校人才培养软肋，也戳到了企业发展的痛处，故而引起了企业的极大兴趣，也激发了高校改革积极性。然而，改革实验毕竟是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组织进行合作，需要各自打破自身惯性，设计一种新的融合性运行机制，这对双方都是极大的挑战。尤其对高校的挑战更大，因为高校的运行机制相对封闭，基本与市场运行脱轨，要转向市场运行轨道非常困难。对于企业而言挑战也不小，因为企业很难忍受高校运行不计成本的经营逻辑，所以要让合作经营成本明晰化和权责合理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双方合作成功，就可以为高校转向市场经济运行轨道提供一个有效范本，如果不成功，就会使人才培养效果大打折扣。

2.高校与产业双向努力是成功基础。面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何正确面对是一个基本问题。这需要校企双方在不断接触和交流过程中达成合作方案。没有人能够预先把一切可能的问题都考虑到并精准地设计好推进路线，而是必须不断地协商探讨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双方都有信心和耐心，坚信一定有解决问题之策，一定有达到双方满意的路径，都不能急于求成。一般而言，企业讲求效益，追求工作效率，倾向于快速制定详细具体的规定，然后就可以照章办事。学校讲求育人价值，讲求无形效益，在面对不确定情境时不希望草率地作出决定，避免陷入不遵守协议规定的被动状态中。可见，双

方磨合是必须的，需要双方都具有信心和谈判技巧，既要追求效率又不能过于草率，这样的平衡过程非常考验合作双方的智慧。

3.用对人、规划好、机制新形成三道关口。无论高校还是企业，合作创建产业学院最关键的就是选对人和用好人，即由谁出任院长尤为关键。现代产业学院对院长的素质要求非常高，要求其必须具有非常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换言之，仅具有学术工作的经历是无法胜任的。具体而言，首先，院长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明晰学院目标、学校利益、企业核心诉求等，这些都是学校用人考察的前提条件。其次，院长必须具有成功的管理经验，这是一个必备条件，不然在管理上就很难具有威信。再次，院长必须具有与企业合作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从事科研项目还是进行人才培养，这些经历都让他了解企业的运行规律，从而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最后，院长必须具有谈判技巧，必须知道何时必须坚持，何时应该妥协。

如果院长人选得当，就可以把学院的建设规划做好，这些工作蕴含了高度的创造性。显然，规划设计需要详略得当，既不能过于粗疏，不然会造成无章可循，也不能太过细碎，不然就难以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学院运行机制设计需要遵循一种复合逻辑，既要尊重教育规律，又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并且通过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对教育规律的尊重。由此可见，选对人用好人、做好规划设计、确定运行机制是三级紧密联系的链条，最终要落实到运行机制维护上，运行机制维护非常考验设计者的创造性和平衡智慧。

4.项目式教学、科研带动教学是“双优”建设的突破点。现代产业学院运行过程中的鲜明特点在于采用了与传统学院不同的教学组织方式。传统二级学院在教学过程中仍然盛行知识体系传授方式，即将教学方案设计为一门门课程，每门课程都自成体系，课程一般都围绕基本概念、核心概念和具体概念进行演绎，然后辅助一些实践案例来讲解概念形成与演变过程，重点在于让学生掌握知识的体系框架，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最终形成一种稳固的认知模式，至于知识如何应用到现实场景中则很少涉及。而这种设计很难让学生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在具体实践中。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就是要打破这种教学模式，要培养学生即学即用的能

力，如此就需要采用做中学的教学模式，项目式教学是实践这种教学模式的最好载体。但教师要想驾驭好这种教学模式，就需要从事应用型科研，熟悉现实问题场景，并且解决过企业面对的核心问题，从而可以将亲身经验传授给学生。这种无形知识对辅导学生开展项目式学习非常具有价值。这是一种以科研带动教学的模式，也是应用型高校追求“双优”的突破点。因为唯有教师做好应用型科研才能做好社会服务工作，而高校唯有社会服务做得好才能培养好应用型人才，才能提升办学水平，进而使办学能力达到优质水平。故而，有效总结和汲取现代产业学院的成功经验是衡量“双优”评价模式的可行性基础。

五、“双优”建设的突破路径：核心·导向·服务

1.应用型科研质量是影响“双优”建设的核心变量。应用型科研质量是决定“双优”建设成败的关键变量乃至核心变量。一言以蔽之，如果高校的应用型科研做不好，就难以在社会服务上做出突出成绩，更无法培养出大批优质的应用型人才。而教师的科研素质又是其中的关键，因为教师的科研能力素质并不是体现在书本上或口才上，而是体现在示范即行动上，这个行动就表现为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换言之，教师能力水平不体现在学历证书层级上，而是体现在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上，这是一种综合能力，非理论思辨能力所能涵盖。其中涉及与企业管理层的沟通交流能力，与企业技术骨干的科研协作能力，与一线技术工人的深入交流能力，还包括广泛吸收前沿科技信息和综合运用已有知识的能力。如果没有敢于面对错误的勇气，始终保持学者的矜持姿态，很多实际问题就接触不到，一些实用的解决技巧就无法领略，而这些都与复杂技术问题的解决具有密切的关联，绝非理论知识所能涵盖。而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素养是能否做好应用型科研的关键。

2.做好应用型科研需要建立应用导向评价机制。目前让教师从事应用型科研的困难比较大，因为目前科研评价主要侧重论文发表和纵向课题获取，对企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关注不足，对学生应用型成长方向的关切也较为欠缺。因为这些都缺乏有效的衡量指标，恰恰这也是“双优”建设的难点与突破点所在，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获得突破，“双优”建设的成效就难以达成。这要求“双优”建设要改变传统上以学术业绩进行排名的评价逻辑，转向以为企业作出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逻辑。高校为企业发展服务，就是实实在在为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只有高校具有服务企业的能力才能扎扎实实地培养应用型人才，因为教师从事应用型科研的经历既可以转化为项目式教学素材，也可以转化为开展项目式教学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体现在学生参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学生一起参与探讨现实问题的活动中，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使他们的创造性潜能得以发挥，如此培养了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因而，应用型人才的典型特质是创新创业能力非常强，敢于面对实际问题，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不断成长。

3.应用型评价重在服务企业能力而非学历论文。应用型科研评价必然要关注科研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这两者是相对容易衡量的。然而这些并非全部指标，因为效益高低与市场环境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与企业自身的影响力关系密切。所以，科研评价的重点还在于科研成果所蕴含的技术含量或应用学术价值，也即是否创造性地解决了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这种价值往往不是短期可以衡量的，甚至是具有保密性的，无法用市场价值来衡量。因而评价尺度应兼顾当下与长远，进行综合评估，避免短视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排除唯论文、唯项目和唯学历的干扰，因为它容易把出身当成能力，把论文当成水平标志，把项目作为唯一标准，这种偏向于纯学术性的评价模式不适合应用型科研，也不适用于应用型高校发展水平评价，因为它不能鼓励教师向应用型教学和应用型科研转变，不能发挥有效的导向价值，更容易引向与研究型大学同质化评价的路径。

4.服务社会能力决定育人能力和社会反哺能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是“双优”建设的关键，也是决定高校发展的核心要素。从生态学角度看，高校发展好坏，其主要的观察变量应该是高校与社会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即社会是否大力支持高校发展，高校是否能够有效回馈社会。一旦高校通过培养大量的有用之才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对这些人才给予很大的褒奖，这些人才又反哺母校发展，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动态的平衡系统，从而会促使高校努力去寻求为社会服务的发力点，进而带动高校教师通过研究和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展现自我科研能力，并且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创造力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够在社会上作出独特贡献。这样，高校就带动了社会发展，社会创造出大量财富来支持高校发展，高校又通过支持

教师开展科研项目使自身充满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又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了更大的机遇，高校因此展现出优质的办学能力和优秀的服务区域发展水平。

由此可见，“双优”评价模式的构建应该是以应用型科研评价作为切入点，实现评价导向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衡量“双优”评价模式建构的合理性依据。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双优”工程启动意味着中国高校分类发展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也使中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闭环。实事求是地说，“双优”评价模式建设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已经具有长期的实践探索基础，许多地区都对“双优”建设进行了前期探索并且摸索出不少有益的经验。这告诉我们，今天要构建“双优”评价模式，需要在总结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改革探索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突破。从现实经验的角度看，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验是对构建“双优”评价模式进行的前期可行性探索。

（信息来源：王洪才、王惠《江苏高教》2026 年第 7 期）

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与师范院校战略选择

一、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对师范院校建设发展的要求

（一）学校发展的历史方位

汉江师范学院历经专科教育时期乃至更早的中等教育阶段，经过上百年建设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跨越式发展，已成功升格为本科院校。不仅如此，学校的学科专业体系、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整体办学实力均有了显著提高。可以说，当前是学校历史上办学实力最强的时期，也是学校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面对这样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如何保持、如何让它发展得更好？这需要从国家形势和湖北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角度，认真思考汉江师范学院的未来。

（二）高等教育生源变化的宏观趋势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 1999 年扩招以来，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湖北高等教育也大发展，汉江师范学院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然而，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

根据研究及教育部相关政策预测，高等教育现有增长态势最长还可延续十年。十年以后将面临何种局面，值得深入研判。

从高等教育生源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为 18 至 22 周岁五个年龄段。根据国家人口统计数据，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化趋势大致如下：

2025 年：约 7700 万

2027 年：约 8300 万

2028 年：约 8500 万

2029 年：约 8600 万

2030 年：约 8900 万

2031 年：约 8900 万（略有增加）

2032 年：约 9000 万以上

2033 年：回落至约 8900 万

2034 年：再次上涨至约 9000 万以上

2035 年：回落至约 8900 万

2036 年：大幅减少至约 8600 万

2037 年：约 8200 万

2039 年：约 7700 万

2040 年以后：降至 5000 万以下

由此可见，未来十五年将经历“增长期—稳定期—快速减少期”三个阶段。未来十年生源有充分保证，但此后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全国看，2025 年高等教育总规模 4872 万人，毛入学率 61.3%；本专科在校生 3900 多万人，研究生教育 429 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 92.8%，接近 93%，适龄人口中只有不到 8%没有上高中。因此，未来五到十年，全国生源有充分保障。再后五年，适龄人口在 8900 万至 9000 万高位波动，生源也有保障。但再后五年，将年年下降，一年不如一年，高校招生会出大问题。到 2040 年、2041 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只有 5000 万人，五年间减少 4000 万，态势非常严峻。

以湖北省为例：2016 年全省新出生人口 74 万（新世纪以来最高峰），2025

年降至24万。2016年出生的人口将于2034年上大学，而2025年出生的人口将于2043年左右上大学。当前湖北省本专科年招生60万人且仍在增长，但到2043年仅有24万人可供招生，缺口巨大。

（三）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提质扩容

国家目前出台的政策主要面向2035年,2035年以后的政策正在做预研究。2035 年以前，国家相关政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要求可概括为四个字：提质扩容。

提质：当前高等教育整体规模已很大（2025年本专科在校生3900多万，总规模4872万人，研究生教育429万人）。但这一规模是1999年扩招以来短期内快速扩起来的——2000 年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仅 990 万，普通本专科规模560万。二十多年来规模大幅增长，但内涵建设、质量保障仍需加强。2000年全国高校1041所，2025年增至2919所，其中1554所是高职高专院校，基本为2000年以来新建或在专科层次办学;1365所本科高校中,700多所为2000年以来在本科层次办学。这种发展态势下，能保证基本办学质量已属不易，整体质量仍需大力提升。

扩容：适龄人口仍在增加，若不扩招则高等教育覆盖面下降。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到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70%以上，总规模接近6000万人。研究生教育规模到2035年要增至750万人以上（2025年为429万，2023年为388万，即在388万基础上翻一番）。这意味着未来十年研究生教育还有320万人以上的增长空间,这是提高办学层次的最后机会窗口——没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要尽快争取，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要尽快获得。一旦研究生教育总规模达到750万人以上，此后将不再大幅增加，学位点布局也将基本稳定。

（四）师范院校面临的特殊挑战

在教育部关于高校未来调整变化的研究中，有两类院校最为特殊：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校。理工农医类院校为社会经济产业发展服务，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仍有巨大空间——8亿劳动力中仅25%接受了高等教育，75%未接受高等教育，其中36%仅接受初中阶段教育。中西部地区、山区农村发展需求巨大，经

济产业发展不愁没有空间。

但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校不同。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对师范院校尤为现实：幼儿园已调整到位，小学正在调整，接下来是初中、高中，再到高校，各年龄段适龄人口都将逐步调整到低位。传统三级师范体系（中师、师专、本科师范）已演变为以本科为主的教师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建立仅二十余年，就将面临大洗牌。十年前大规模发展的学前教育专业，如今很多已撤销或大幅减少招生。

同时，教育强国建设对师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中小幼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者应达到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到 2035 年，专科层次的教师教育可能几乎没有存在空间。师范院校既有与其他高校共同的生源不足挑战，又因主体性任务是教师教育而面临更特殊的压力。

（五）人工智能带来的新课题

人工智能不仅影响生活和社会生产，也深刻影响高校教学。学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工具快速获取知识、完成作业，传统课堂教学面临挑战。教育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将其视为“新赛道”。在传统赛道上，欧美国家办大学有上千年历史，美国也有四百多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仅四十八年稳定发展，要超越很难；但在新赛道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起步时间相近，只要抓住机遇、做好应对，就有可能跑出加速度。

人工智能对全球各级各类教育都提出了新课题。高校必须主动适应，推进改革。这一变革要求与人口变化趋势同步到来，增加了变革难度，但无法逃避，必须做好应对。

（六）形势判断

综合以上分析，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态势是：

未来五年（“十五五”）：继续保持增长扩招态势；

其后五年（“十六五”）：在“十五五”基础上进一步维持发展状态；

再后五年（“十七五”）：进入大调整时期，政策将完全不同。

这十年可视为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扩招的延长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最后十年，也是各级各类学校应对十七五大变局的缓冲期和准备期。我们必须在这十年内把学校发展方向弄清楚，加强建设、加快发展，使

学校在全省乃至全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得更好的位置和定位。

二、师范院校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师范院校办学的内在矛盾

师范教育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前师范院校的构成已很复杂。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各类师范教育（师范本科、教师教育、教育硕士、教育博士等）加起来占比约20%。越是高水平大学，教师教育占比越低。这引发了一个长期争论：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矛盾。

同样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武汉大学的可以面向无限学科发展空间，而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师范）”则只能盯着中学语文教育的要求来办学。带了“师范”二字，就如同戴上了紧箍咒，发展只能盯着中小学教育的要求。这导致教师教育的眼界越来越窄，同样的学科因一个“括号”而出现不同的办学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曾倡导发展学术、提高学术水平，受到批评后采取“只做不说”的策略，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到了“双一流”建设时期，这些学校的“双一流”很多，教育学科也是一流的，其他非师范学科也取得进步上，已成为综合性大学。但其他很多师范院校则真的“很听话”，把教师教育抓得很实，但学术发展、学科领域开拓没有抓得那么紧。

此外，非师范专业的办学也存在问题。很多师范院校办非师范专业时，仍以师范教育的基本模式来办——主要是学科教育加教育实习，与中小学的联系主要通过实习建立。而现代非师范教育强调产教融合、校企深度合作，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专业往往难以开拓，办不出很强的非师范学科专业。

（二）两种办学模式：常规办学与战略办学

所有学校办学大体有两种基本模式，带来两种发展结果：

第一种：常规办学模式

即按部就班地制定培养方案、安排课程、推进教学，一届又一届学生进来出去，不断循环。科学研究也有常规——申报课题、立项研究、中期检查、结项，再申报，一轮又一轮。学校各项工作按常规运转。

常规办学带来的结果是：每年比上一年有一点进步，小碎步式前进，需要

长期积累才能看到较大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下的目标都是“踮起脚尖够得着”的约束性目标，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不具有不确定性，不会对学校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种：战略办学模式

即在特定时期，通过实施重大战略行动，解决长期制约学校发展的问题，或开拓新的发展领域、新的空间，培育新的生长点，实现办学格局的大变化，带来学校发展的重大进步。这种发展往往具有格局性，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更大发展。

战略办学的典型案例：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学科

1998 年前后，华中科技大学黄德修教授意识到未来通讯将是无线通讯，而无线通讯主要利用光波。他建议学校领导发展光电子学科。学校领导研究后形成共识：不仅华中科技大学要发展，还要把武汉地区的力量结合起来，上升到国家层面。华中科技大学创办光电子学院（最初为平台学院），联合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大学、邮电科学研究院等力量，组建国家光电实验室（后改为国家光电工程中心），并推动在武汉建设国家光纤通讯产业基地。

经过约十年努力，光电子学科建成，现为全国第一、世界前列；光谷建成，光电子产业基地产值达数千亿元。华中科技大学通过这一战略行动，开拓了新的办学空间，使光电子学科与机械、电气、医科等强势学科平起平坐。华中科技大学通过持续战略行动，不断开拓办学空间，走在前列。

战略办学的核心要素

战略办学包含三个关键要素：

1.战略愿景：想做出什么，要把学校或二级学院办成什么样。如“区域高水平师范大学”，需要把其内涵、要求、表现形态、作用特点等一整套内容表达清晰白。

2.战略目标：为实现战略愿景而进行的阶段性任务分解，形成一套目标链，构成实现战略愿景的路线图。

3.战略行动：在当下阶段，针对战略愿景和战略目标，落实几项重大行动，往往通过重点工程、计划、项目等来实现。战略行动需要汇聚资源、进行强烈

投入，解决关键问题。很多学校规划中提出的“十大工程”“十二大工程”，大多只是常规工作计划，不能算重大行动。战略行动需要汇聚资源、强烈投入，解决关键问题，使学校在常规办学同时真正有大发展。

（三）治理机制改革：激发二级学院活力

实施战略发展不是学校几个领导的事情，需要全校一盘棋共同努力。在中国大学办学中，干部的作用丝毫不比教师弱。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曾提出“愿意用十个教授去换一个能干的处长”，因为有一个能干的处长，何愁引不来二三十个更好的教授。

然而，大学组织具有“底部沉重”的特点：越往下越不动，领导带不动，教师如果没有行政职务，干事创业会阻力重重。因此，仅靠领导和管理远远不够，需要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的两个方面：

1.学校层面与二级院系层面的治理：赋予二级院系职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机制，让二级学院能够想事情、谋事情，制定自己的战略规划，落实自己的战略发展。每个二级学院都有特定的学科、办学基础条件和发展需要，不可能齐步走、用一个要求来做。只有让二级学院自己去想自己的事，发展才有效。学校行政部门既要规划，更要提供支持和服务。学校支持二级学院发展，二级学院主动办学，上下配合，学校才能更好发展。

2.对外关系的治理：不仅学校要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二级学院也要对外建立相应联系，依托教师资源建立稳定的合作办学、联合办学机制。这是一种学术治理关系，需要把二级学院的办学自主性落到实处。

如果真正让二级学院动起来，学校一定充满无限的合力和积极性。学校要在维持常规办学的同时，抓战略办学，抓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建设，让学校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结语

未来十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后黄金机遇期，也是应对大变局的缓冲期和准备期。如果我们只有常规办学，就如同在市区开车，遇到红灯要停、单行线要绕、行人要慢，开不出里程，耗油还多。只有跨过高速公路闸口，才能踩油

门往前奔。应对未来的历史性机遇，相信汉江师范学院一定能够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根据别敦荣2026年9月18日在汉江师范学院的讲座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